

法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般若山

中央文獻出版社

正直无私

廉洁奉公

王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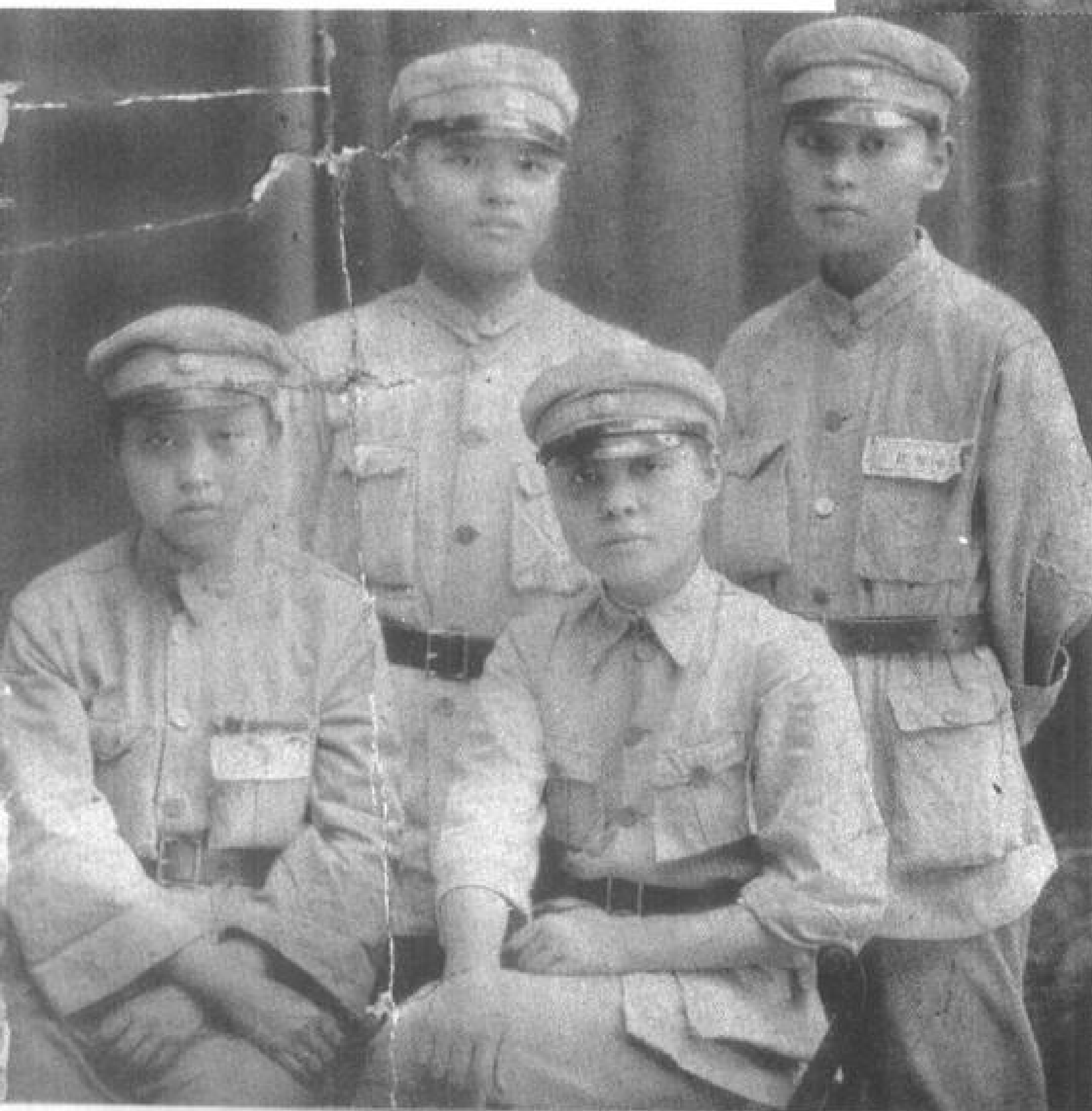


80年代的曾宪植同志



少年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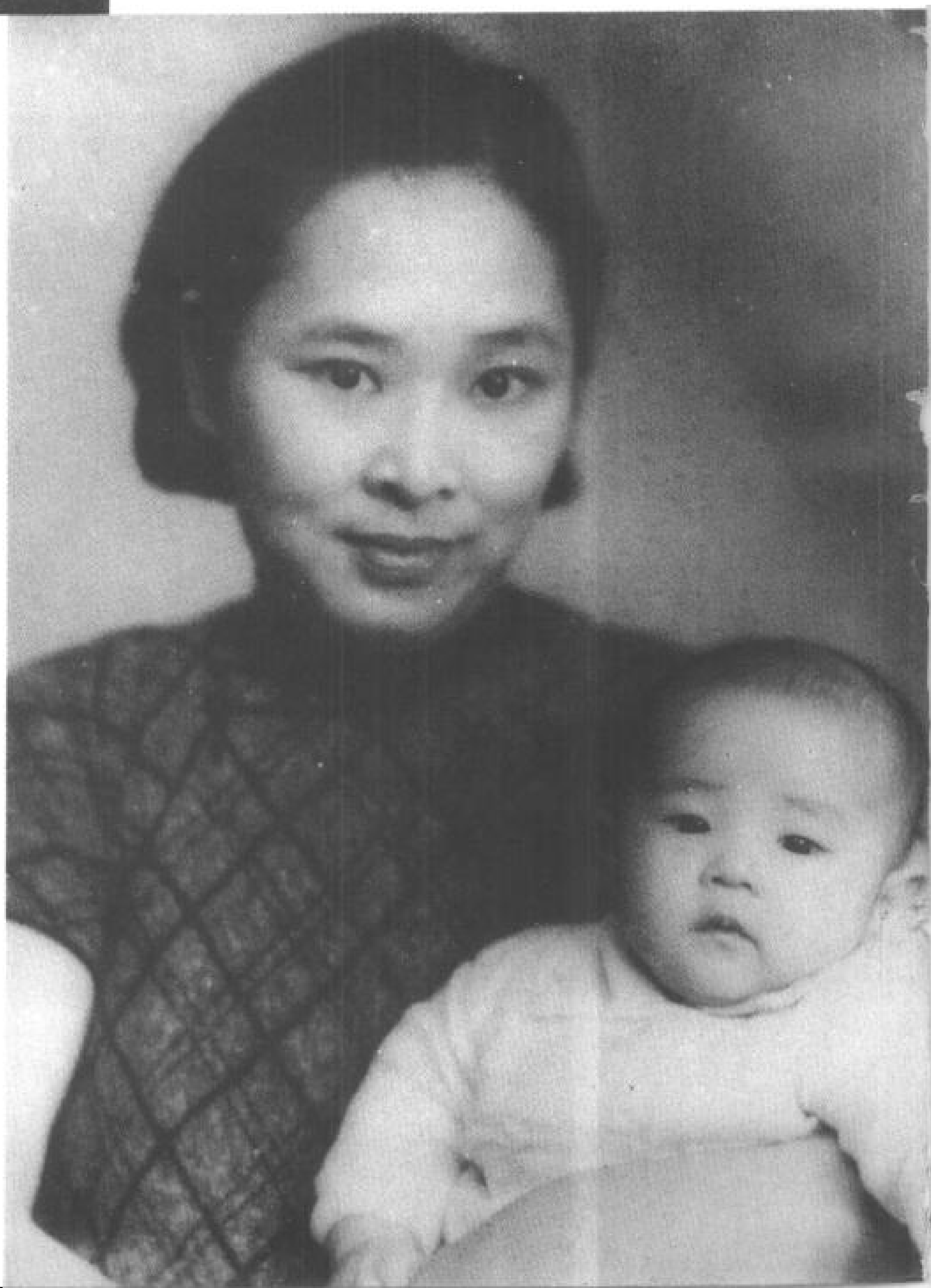
1957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参加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右一为曾宪植



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员合影
(后排右一为曾宪植)



在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的曾宪植同志



和爱子在一起



1945年，邓颖超、曾宪植(中)夏之栩
在延安杨家岭合影



50年代，和宋庆龄合影



50年代，曹孟君
(左起)、曾宪植、
李德全、邓颖超、
谭惕吾合影



50年代，张元(左起)
周恩来、曾宪植、陈楚平合影

1958年12月，全国妇女
积极分子大会期间曾宪
植参加天安门革命历史
博物馆建馆义务劳动



1956年5月，曾宪植(中排左第五人)郭建等
同志到农村搞调查研究时与地方干部合影

1978年9月，曾宪植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上讲话



曾宪植（左三）访问罗马尼亚时，与少年宫的儿童在一起



1989年，王震同志在
外地看望曾宪植

1988年8月25日，与
前来看望的帅孟奇大
姐（左）在一起



1986年2月19日，罗琼、黄
甘英、曾宪植（右三）、张
洁珣、郭力文、董边、吴全
衡在董边家里开党小组会

目 录

深切怀念阿曾同志·····	帅孟奇 (1)
风范常驻人间·····	康克清 (5)
沉痛悼念曾宪植同志·····	章 蕴 (10)
英雄女兵曾宪植·····	黄静汶 (11)
真挚的友情、永恒的思念·····	郭霁云 (16)
忆阿曾同志·····	凌 云 余海宇 梅健群 (21)
思念阿曾同志·····	刘 涌 金 信 (25)
她心里想的总是别人·····	杨蕴玉 (28)
良师益友 干部知音·····	王 云 (35)
阿曾同志, 我们怀念你·····	黄甘英 张文松 (42)
无私无畏 顶风破浪·····	曹冠群 (51)
不尽哀思·····	罗 琼 (59)
念阿曾·····	张洁珣 (61)
心底无私, 坚持真理·····	董 边 (63)
高风亮节 斯人永在·····	杜子明 (73)
一个纯粹的人·····	吕 璜 (80)
阿曾同志永远活在我心中·····	李纪阳 (92)
阿曾, 我们的良师益友·····	姜辛耘 (101)
永远怀念好大姐阿曾·····	伍乃茵 (105)
缅怀敬爱的领导阿曾同志·····	管梅璠 (120)
革命风范 长留人间·····	柳勉之 (124)

缅怀敬爱的阿曾同志.....刘革非 (133)

难忘的几件事.....侯 荻 (138)

一个政治上开朗有远见的领导

——忆曾宪植同志做思想政治工作.....杨 蕴 (142)

忆曾宪植同志同我的一次谈话.....杜黎均 (153)

洒下春露在人间.....盛 愉 (157)

悼念敬爱的阿曾大姐.....吴思怡 (163)

曾宪植同志在干校.....沈 颖 (167)

曾宪植同志生平..... (174)

编后记..... (178)

深切怀念阿曾同志

帅 孟 奇

阿曾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她的逝世，使我悲痛，再不能听到她那爽朗的笑声和明确的见解了。

我从1940年在桂林和阿曾相识，几十年来，常来常往，还曾在一起工作过较短的时间。我们在政治和干部问题上的意见总是一致的，彼此谈得来，我喜欢她那坚强、豁达、乐观的性格。

记得1948年山东济南解放不久，工厂工人闹罢工，当时我和阿曾都在中央临时所在地西柏坡。组织上认为我做女工工作，派我去济南处理罢工问题，阿曾、康克清和我同行。

到了济南，当时没有招待所，更没有宾馆，没有地方住。阿曾立刻给济南市市长徐冰同志打电话说：“帅大姐来了，你还不快来接。”徐冰同志马上就到，找到一个学校去住。有一天，在济南市街上，阿曾碰到田家英，他当时已任毛主席的秘书，但他并没有以此身份找领导同志，因此，也没有地方住。阿曾把他带到我们住处说：“你叫一声帅妈妈，就帮你找地方住。”家英照办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文化大革命”中，还追查我和田家英的干亲关系，其实，就是阿曾说的笑话。

我和克清、阿曾亲自到发生问题的工厂，经过调查，找到发生问题的原因，是缺乏管理工厂的经验，管理不善，工人有意见，找到原因，很快解决了问题。

从济南回到西柏坡，于9月20日中央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把阿曾从中央组织部借调到中央妇委，帮助工作。1949年1月12日，成立了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蔡畅同志被选为筹委会主任，邓颖超、李德全为副主任。我当时是中央妇委秘书长，阿曾仍留在中央妇委帮助筹备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她负责组织工作，于2月就带领几位同志进北平打前站，我和中央妇委同志是3月初才进北平的。

3月24日到4月3日，在北平召开了全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开得很成功，通过新时期妇女运动的方针任务，成立了全国性的机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当时大会选举蔡畅为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李德全为副主席。我任全国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阿曾任全国妇联副秘书长，管机关行政、干部和机关党委工作；还兼管国际工作和统战工作。全国妇联初建时期，工作人员只有72人。在蔡畅、邓颖超为首的党组领导下，阿曾经常和我商量选择、调配干部，充实全国妇联机构，她在干部问题上，采取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的原则，使全国妇联各部门的干部充实起来。

1949年7月，因工作需要，我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但还兼任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直到1952年，才不兼职了。虽然在妇联不兼职了，但在干部问题上，阿曾还是经常和我商量。特别在反右派运动中，丈夫有问题，就株连老婆。全国妇联有一位同志的丈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组织上要她揭发丈夫的问题，她认为丈夫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没有写揭发材料，就说她和右派丈夫划不清界线，要开除她的党籍。阿曾同志坚决反对这种株连政策，向我反映了意见。当时我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找了中监委的领导同

志，了解情况，并进行了说理教育，才免于给女方开除党籍的处分。另一位全国妇联同志，丈夫被划为右派分子，夫妻被迫离了婚，男方家有老母，生活很困难。阿曾又向我反映，我帮助解决了男方的生活困难，并鼓励他振作精神，为党工作。阿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态度是：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随风跑，不怕丢乌纱帽，敢于说真话，有自己的见解，这是很可贵的。她心底无私，坚持原则，处理干部问题是公正的，所以受到干部的尊敬和好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我和阿曾都被打倒了。我在卫戍区关押七年，流放江西萍乡两年，阿曾被监禁在机关内，后到干校劳动改造。我们近十年不通音讯，但心里都在互相思念。阿曾解放后，到处打听我的消息。当她知道我仍流放江西，她找到我的养女舒炜，千方百计把我的申诉书转交邓小平同志。经过邓小平同志批示，我于1977年冬才回到北京，住北京医院养病。当阿曾到医院来看我时，两人心情激动，有说不完的话，虽然都老了，但都还想为党工作。可惜不久，阿曾就病倒了，未能实现她的心愿。

阿曾和干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她是干部的知心朋友，没有领导者的架子。同志们有事，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找她谈。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设身处地为同志们解决问题，使妇联党内外干部，团结一致，发奋工作。阿曾的生活是艰苦朴素的，永远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作风。

阿曾啊！你一生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奋斗，你一生关心别人超过自己。你是干部的知音和老师，你在工作中勤勤恳恳无私奉献的精神，你在政治运动中是非分明、敢于坚持原则的精神，你那宽阔的胸怀、团结同志共同奋斗的精

神，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我永远深切怀念你。

安息吧！阿曾同志！

1990年10月

风范常驻人间

康克清

阿曾同志逝世已两年。妇联上上下下和社会各界，凡是接触过她的同志，都深深地怀念她。怀念她一身正气，艰苦创业，勇挑重担的精神，怀念她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爱护备至的作风。她的音容笑貌，炯炯有神的目光，干脆爽朗的谈吐，胸怀坦荡的品格……常常萦迴在我的脑际。

随着回忆，可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记得40年代初，我在延安第一次见到阿曾同志，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洒脱、幽默、气度不凡。她当时正在马列学院学习，只知道她是曾国藩的后代，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队员，曾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被捕后坚贞不屈，经我地下党营救出狱。她到达延安时，正是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延安的物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阿曾同志的兴趣比较广泛。她爱好京剧，在业余时间，有时约上三五人，拉起二胡，她爱唱须生、有人唱青衣，就在窑洞里唱起来。吸引了不少听众。节假日，她常和郭霁云来我家串门，朱老总爱摆龙门阵，给她们讲百团大战，前方战事情况……她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我们一起吃便饭，有个炒鸡蛋就是改善生活了。碰上夏天，我就用门前自种的西红柿招待她们，真是其乐融融。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都在全国妇联工作。初创阶段，工作比较艰难，但她善于打开局面，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尤其是统战工作，她更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邓裕志、副总干事施如璋都亲切地忆及五、六十年代曾宪植同志分管三团体（中华妇女节制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会员工作时的情景；每当她们来京开会，阿曾同志都要去看望她们，或约来妇联宿舍促膝谈心，了解她们的工作情况和有什么困难，并真诚地给予帮助。80年代中期，我去邓裕志先生寓所看望她时，她满怀深情地对我说：“阿曾同志身体可好？我们真想念她，每想到她分管我们工作的岁月，心头总充满了无限亲切与温暖。她不仅关心我们的工作，同时也关心我们思想和生活。她对我们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坦诚相见。我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她倾吐。遇上困难，只要向她反映，她就会想方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她特别鼓励我们开展知识界和工商界妇女工作，形象地说：敲开红漆门，请她们出来参加社会活动。后来确实起到了很好效果。60年代初，她为我们创造条件，在北京召开了各地女青年会的工作座谈会，交流了经验，明确了方向，促进了工作的发展。阿曾同志办事利索、果断，体察民情，真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娘家人。”这一席话，深深印在我心里。

50年代，人们特别颂扬自然美，提倡艰苦朴素。爱国人士刘王立明当时是全国妇联常委，常来妇联开会。有的同志见到她画眉涂脂、戴假发，很不顺眼，就说俏皮话：“真象个三仙姑”。这话给阿曾听到了，她严肃批评说：“怎么能这样不尊重刘王立明先生？她是中华妇女节制会的负责人，解放前在上海，为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做了不少工作。她的丈夫刘湛思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因坚决抗日，遭到了侵略者的暗杀。我们